

# “大跃进”时期农具改革运动透析\*

李安峰

摘要：“大跃进”时期的农具改革，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建国初期的农具改良工作，后来在1957年冬掀起的全国水利建设浪潮中逐渐走向高潮，从日常的农业生产工具再到生活工具，波及面较广。在“左”的思想引领下，农具改革坚持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利用土法上马、发动各地互相协作以及开展竞赛等实现途径，虽然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并取得了一定成绩，不过也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较大浪费。因时代条件的限制，当这场运动落下帷幕时，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面，留给后来者的是不断的反思。

关键词：大跃进；农具改革；考察

中图分类号：K87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5)04-0138-06

农具的使用作为农田耕作的外在表达，自战国时期开始，伴随着冶铁技术的进步，铁器农具被逐渐推广，经过历朝历代的创造和改良，农具的种类也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种类齐全，可以说传统农具支撑着整个农耕大国的发展。近代以降，作为东方的农耕大国，我国农具水平基本上仍处于传统技术阶段，一方面由于近代长期国内战争的破坏，另一方面也与我国农民传统的耕作习惯和经验让其对现代农具使用有种恐惧不适应之感有关。因此，到新中国成立之时，传统的农具虽十分落后但仍然支撑着整个国家的农田耕作。建国伊始，在中央的领导之下，为恢复和发展农业经济，全国掀起了农具改良浪潮，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我国农业生产水平，初步改变了广大农民固守使用传统农具的思维经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赶英超美，同时也为增强农业对工业建设的支持力度，在工农

业生产等领域“左”的指导思想迅速抬头，一场“大跃进”运动酝酿而生。农具改革作为“大跃进”时期农业战线上技术革命的主要内容之一，也作为建国初农具改良工作的一次延伸，同时是适应当时水利建设高潮进而实现所谓的农业机械化半机械化而进行的一次尝试，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这场农具改革运动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积累了一些经验，但也存在大量的问题和教训，加上当时国家工业化水平低等条件限制，这场靠“左”的思想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农具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技术落后的局面。

## 一、动因分析

任何事物或事件的产生发展都是偶然性中的必然，背后都有一定动因的推动，大多时候这种动因又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这些因素中有的是主要的，有的是次要的，有的是直接的，有的是间接的，但它们都在无形或有形之

李安峰，男，厦门大学博士研究生，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史。

\* 基金项目：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十二个五年计划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项目编号：11BKS021）。

中起到了引导或推波助澜的作用。“大跃进”时期的农具改革运动并不带有偶然性,它是在时代条件下由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一方面它是建国初期农具改良的一次延伸;另一方面也可称之为最直接的动因就是1957年冬全国掀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当时为提高水利建设工效诱发了农具改革的激进,而毛泽东这种领袖魅力的巨大号召以及当时在全国推行所谓的技术革命运动又让这一激进的农具改革变得脱离正常轨道转向“左”。下面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诱发“大跃进”时期农具改革运动的几种主要的动因。

首先,这是建国初期农具改良工作的一次延伸。新中国成立初期,因近代以来长期的战乱破坏和工业技术水平的落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广大农村仍然是使用传统的农具从事生产生活,这时落后的农业技术已经跟不上国家农业急速发展的需要。因此,为迅速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工业化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在党的有力领导下,全国农村广泛开展了农具改良工作。通过各地的广泛宣传动员,在土地改革和合作化开展的过程中,广大群众积极参与,把传统经验与现有技术相结合。农具改良工作主要是整修旧的农具,生产并推广新式农具以恢复并提高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也为开展工业建设服务。该时期的农具改良总体上是在相对平稳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初步改变了农村农具落后的面貌,培养了一批技术骨干,积累了一些经验。不过这项工作“在对农村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设计和制造能力相当差,材料和资金难以保障,技术队伍水平和群众素质低下的情况下,主观地认为可以通过行政手段推广使用新式农具,在落实任务时对群众搞强迫命令,硬性摊派,结果不仅未能完成推广指标,反而违背了群众的意志,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也影响了政府的形象”<sup>[1]</sup>。从这一时期的农具改良工作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之后“大跃进”时期农具改革的影子,因为后者的很多做法在建国初期的农具改良工作中多少有所展现,只不过当时没有激荡而变的“左”起来,当然它也为后来的全国农具改革奠定了一定的组织和群众基础。

其次,这场农具改革运动率先从改良水利工具发酵。苏共二十大后,在毛泽东的率领下,为摆脱苏联建设模式的掣肘,积极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道路,也为进一步发展工业提供资本的积累和农业的支援,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以此增加粮食产量就成为当时农业发展的重头戏,而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自然成为首选目标。为此,1957年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决定该年的冬季到1958年春季在全国掀起一场农田水利运动,以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的水利规划。这时全国“大跃进”的号角其实已经吹起,在不断的批判“反冒进”和右倾思想之下,各地的农田水利规划层层加码,水利建设速度要求越来越快,为完成指标,加快速度,提高水利施工工效成为关键,因此,全国各地的水利工地广泛开展了水利工具改革以此提高工程建设的速度。1958年3月《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农村的工具改革“这个运动发生在直接从事农田水利建设的农民群众中。制造者多半是农民,是农民中间的木匠和铁匠,是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sup>[6](P149)</sup>在不断的宣传鼓动之下,通过辩论和大鸣大放等,水利工具的改革迅速扩展到农村的其他生产生活工具,并提出了加快实现农业半机械化、机械化的口号,而这被称之为技术革命的萌芽,印有当时人们对农村工具迫切革新之梦的印迹。

再次,毛泽东称农具改革是技术革命的萌芽和重要组成部分,领袖号召和技术革命思潮的掀起为这场运动注入了新鲜的澎湃的血液。当时称之为思想和政治战线的革命即整风、反右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基本完成后,在1958年1月毛泽东认为“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sup>[2](P349-350)</sup>同年3月份举行的成都会议上,毛泽东认为目前在农村进行的农具改革是技术革命的萌芽,意义非常巨大,可以消灭人挑肩背,提高效率。毛泽东的个人魅力和崇高声望无疑成为这场运动的有力号召资本,随后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重新规划部署本地的农具改革发展规划,技术革命思潮也在毛泽东的推动下全面掀起。同

年,在党的八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提出了技术革命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尽可能地采用世界上最新的技术成就的同时,在全国的城市和农村中广泛地开展改良工具和革新技术的群众运动。”<sup>[3]</sup>当农具改革被纳入到技术革命范围之后,在中央号召和各级党组织的有力领导之下,各地不断率领群众去践行这一论断的正确性,这也让农具改革运动的风暴迅速席卷整个农村大地,延伸到农村的每一个角落,由此又进一步刺激了农业生产的大跃进。

最后,农具改革在当时被看作是缓解劳动力紧张的有效方法。作为农业人口大国,我国的劳动力非常丰富,但在1957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投入了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这期间工农业及其他行业的“大跃进”也迅速展开,这就造成了劳动力相对紧张的局面,在春耕和夏收的过程中农业战线上的劳动力尤显不足。为提高各生产领域的工效以节省劳动力成为当时所关心的问题,而在水利建设过程中进行的工具改革也证明这是提高工效缓解劳动力紧张的有效措施。如湖北当阳县通过工具改革,“全县兴修水利工程节省了人工五十七万二千个,在整个冬季生产中,估计节省出一百多万人工,投入农业的全面生产。”<sup>[4]</sup>又如云南弥渡县1958年劳力缺1400万个工,而通过农具改革解决了约一千万个工。<sup>[9](P34)</sup>“通过各地的经验证明,农具改革是解决目前农业生产大跃进中劳畜力不足的正确途径,是保证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基本关键。”<sup>[3](P341-342)</sup>因此,进行工具改革被认为是节省农村劳动力提高工效的最有效途径。总之,在经过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之下,农具改革的激荡冲击波迅速覆盖了各地农村和广大农民群众,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农具改革运动伴随着“大跃进”的迅速延伸不断走向高潮。

## 二、实现途径

1958年3月,成都会议后各地农具改革由原先的水利工具迅速扩展到农村其他的生产和生活领域。同年5月5日,全国农具展览会在北京开幕,展示了当时广大工农群众自己创造改良的农具。刘少奇在参观广东农具展览会时说:“这

样的技术革新运动,像一部车子已经开动了,永远不会停止,一天不停,一万年不停。”<sup>[5]</sup>为对这场运动进行规范性的引领并使其进一步推向高潮,同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了关于迅速在农村展开农具改良运动的指示,号召从省到县到社都应建立专门负责推广农具的领导班子,加强领导。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及各地官方报纸大力宣传广大群众在农具改革中的创造性和取得的成绩,一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农具改革拉开了大幕。在这场运动中,中央和各地不断强化领导,通过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采取土法上马、开展竞赛以及各地互相协作交流等途径,使运动的波浪一浪高过一浪,让农村的时空在激荡的尘埃中激情四射、热火朝天。

第一,坚持政治挂帅。政治挂帅是“大跃进”时期一种特有的领导方式。因当时党的基层组织已经在全国各地乡村建立起来,坚持政治挂帅的实质就是强化党的领导,以确保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也能充分动员群众,让党的政策延伸到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农具改革过程中,中央和各地政府认为“坚持政治挂帅,书记专管,全党动手,全民动员,是工具改革运动迅速发展和获得巨大成效的决定因素。”<sup>[7](P345)</sup>各地在运动中始终坚持政治挂帅,如“河南长葛县委书记亲自率领各乡党委书记几次参观,就地鸣放辩论,制定领导工具改革的计划。全县33个乡的党委委员和绝大部分社的支部书记,都和积极分子一道,钻研创造,全县4000多个农村党员,发明创造1万多件新工具。”<sup>[7](P345)</sup>又如云南宜良县成立技术革新指导委员会,“书记挂帅,全党动手,加强对农具改革运动的具体领导。”<sup>[9](P104)</sup>但政治挂帅是在当时“左”的经济指导方针下进行的,由于过分强调政治性和党的领导职能,这就存在着在农具改革过程中只注重政治而忽视客观条件的问题,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这让运动逐渐偏离了正常的轨道,产生了狂热的政治行为和负面的后果。

第二,动员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建国后,党把革命战争年代的动员群众、搞群众运动作为正确的经验广泛运用到政治和经济领域,从某种程



度上说,“大跃进”实为一场经济建设的群众运动,而农具改革作为“大跃进”在农村、农业中的具体表现,深深地打上了群众运动的烙印。农具是乡村耕种和农民日常生活所需的工具,与群众密切相关,因此在农具改革的过程中,中央要求各地要广泛发动、依靠群众,并认为大搞群众运动是开展工具改革运动的正确路线。为此,各地采用当时的大鸣大放、大辩论和大字报的方法,就农具改革展开激烈的讨论,以此提高群众觉悟并达到认识上的统一,如“晋宁县大河乡有的妇女说人背可以一直背到田里,推车倒反麻烦。富裕中农魏荣华,当干部让其打推车,他说不会打。最后通过大辩论、采用大字报形式,大大的教育提高了群众,迅速地掀起了一个人人打推车的高潮。”<sup>[9](P62)</sup>与此同时,在各地也开展了所谓的群众献计、献料、献力的运动,以此激发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如江苏扬州专区1958年一年“群众献出杂树3000多万斤,钢铁80多万斤,麻16万斤。”<sup>[7](P345)</sup>当群众在“左”的思想和强大政治压力下被发动起来后,许多我们今天想不到的结果在当时都被认为是正常的,如河南“商水县杨河乡一天一夜即创制新式工具一百多件;高庄乡两天两夜创制了三百九十件。”<sup>[6](P204)</sup>大搞群众运动在当时特有的语境下被认为是实现农具改革的最有效举措,在中央和各级政府看来,各地群众创造出了让人振奋的成绩。不过,这种大搞群众运动的农具改革,在当时比较落后的农具水平条件下不仅不可能实现农业的机械化,而且浪费了大量的劳动力和物力、财力,在今天看来是不可取的。

第三,土法上马,开展竞赛。当时,国家的工业发展刚起步,不可能给广大农村提供充足的农业机械,因此,在农具改革一开始,各地就广泛动员群众,利用土法上马,充分利用原有的铁匠、木匠、有经验的农民等,采取师傅带徒弟、老手带新手等方式,在原有的农具基础上进行改良,大胆革新、不断创造,先普及后提高,形成了所谓的“家家是工厂,人人当工匠”的局面。这种土法上马实际上是传统经验和现有技术水平的一次结合,在工业化很低的条件限制下不可能根本上扭

转传统农具一统天下的局面。与此同时,各乡社、队之间广泛开展农具改革竞赛,企图利用评比竞赛来提高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热情,如湖北当阳县跑马乡在“二十天当中,组织了全乡性的参观评比四次,社与社之间的参观评比七次。”<sup>[6](P230)</sup>又如云南省大河乡“贴出大字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的车子打的快。给群众鼓舞很大,有的说你们工作那样忙都能保证打起来,我们也要保证打起来。”<sup>[9](P65)</sup>农具改革竞赛在外在强大的政治压力和运动氛围之下,表面上确实搞得轰轰烈烈,不过这种热火朝天很快由于“大跃进”失误的不断凸显而慢慢降下温来。

第四,各地开展大协作,互相支援。农村集体化打破了传统村落相对封闭的局面,让广大农民成为集体的一员,在共产主义说教之下,农民千百年来的个体劳作特征被互相协作、共同劳动的集体所代替,在党的领导下,每个集体构成了国家的整体,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各集体之间既存在竞争又存在合作。自农具改革运动在农村掀起后,各地在竞争中充分展开大协作,互相支援,在省与省之间、部门之间、村社之间、地区之间、工农之间等互相交流学习经验并在物力、财力、人力和技术上合作以取长补短,这种情况在技术条件落后的地区尤为明显。如贵州省在1958年上半年农具改革报告中指出“鉴于我省的技术水平较差,制造滚珠轴承的技术还很不普遍,有的收割和播种的工具尚未定型,因此,在制造的过程中,紧紧地掌握参观学习,交流经验这一环节。我们马上再组织一批人到云南参观学习,采取边学习、边制造、边推广的办法。”<sup>[13]</sup>除了上面所述之外,还有树立典型、开展参观展览、进行互相学习交流等都被认为是推动农具改革发展以此实现农业半机械化的措施,但这些都是当时的时代背景下为迫切提高农业生产力水平而进行的一种脱离正常发展轨道的超常措施,深深烙下了特殊年代的特殊烙印,所以我们不能一味地去指责,而应批判性反思,以为今天的农业发展和机械化水平的全面实现提供历史的教训借鉴。

### 三、得失之间

建国后,伴随着“一五”计划的实施初步奠定

了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但不可能迅速满足实现农业机械化水平的需要,而企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具技术水平以迈向农业机械化的农具改革运动伴随着“大跃进”的结束而逐渐降温退却。从历史的客观角度来看,在“左”的指导思想和当时的农业技术条件下,这场运动确实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绩,但也存在需要反思的问题。

首先,在成绩上,这场农具改革运动改革了一大批农具,推广了一批新式农具,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技术水平落后的面貌,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1958 年是全国广泛掀起和全面开展农具改革的一年,一年来,“全国创造和改良各种工具 42 万多件,推广 35000 万件(其中包括双轮双铧犁 60 余万部),完成今年规划的 82.5%。全国共生产滚珠轴承 12251 万套,安装滚珠轴承的工具 4474 万件。推广排灌动力机械 120 余万马力。推广绳索牵引机 268 万部及大量深耕犁、快速割禾器和林、牧、副、渔等改良工具。”<sup>[7](P343)</sup>而到 1959 年底,“全国共推广各种改良的和半机械化农具、工具二亿六千二百万件。生产滚珠轴承一千九百九十四万套,安装滚珠轴承的农具七百二十九万件。”<sup>[7](P349)</sup>具体到地方,如山东省仅在 1959 年,“创造和改制的各种先进农具即达一千五百多种,推广和使用二千七百万件。这些农具的推广、使用,一年来为农业生产战线上大约节省了十一亿个工作日,等于增加了四百万个劳动力。”<sup>[8]</sup>不可否认,在当时“左”的经济思想指导下,上面的统计数字肯定存在着片面的夸大性,但我们也可以从中透视出这里面承载着的广大参与者所取得的成绩,而这不仅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业的生产劳动效率,节省了大量劳动力,也为以后走向农业机械化奠定了一定基础。同时,在这场运动中也培养了一批农村群众技术骨干。农具改革运动主要是在农村推进的,参与的主体是直接和土地和农具打交道的普通农民,在这些农民身上流淌着的是传统的工具使用经验和耕作技术方法。在农具改革的过程中,广大农民充分利用传统的经验并发挥自身的创造性,改革了一大批值得肯定的农具,同时也提高了他们的技术觉悟,涌现出了一批群众技术骨干。如云南省

在运动开始时的 1958 年初指出:“农具改良的运动又促使每个合作社都迅速地培养了成批的木工、铁工、石工。”<sup>[9](P6)</sup>如弥渡县“原有木工 556 人,新培养了 2115 人,石工原有 200 人,培养了 1694 人。铁工原有 35 人,培养了 42 人。其中 50% 以上的人学会了全套技术。”<sup>[9](P34-35)</sup>而 1958 年全国“培养了 170 余万人的专业队伍”<sup>[7](P343)</sup>。这些群众性的技术骨干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拥有传统农具经验和初步拥有现代农具机械化知识的结合体,在不远的将来他们对于现代农具机械在农村的推广使用将起到一定的作用。

其次,我们在肯定其成绩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大跃进”是在中央领导之下想通过发动群众迫切改变我国贫困落后面貌的一场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激进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存在着规划指标过高、速度过快、浮夸风、共产风以及唯意志论等不切实际的做法,而具体到农具改革,这种脱离实际且超越当时农业技术水平的做法也尤为明显。第一,任务指标过高。农具改革浪潮掀起后,在“人人当工匠,户户是工厂”的号召下,中央和各地方政府加大宣传力度并相继制定了不符合当时农村和农业实际的计划指标,如中央对 1959 年工具改革的要求是“保证完成半机械化的任务,即在生产生活方面的各种主要劳动实现改良工具化,一切运转工具实现滚珠轴承化,尽量以蓄力、动力代替人力。”<sup>[7](P346)</sup>而地方政府如广东省提出“争取在三、五年内基本实现机械化和半机械化是完全可能的。”<sup>[10]</sup>这些过高的任务指标要求明显是不符合当时国情和各地的实际情况,带有过激的“左”的做法,而这在高度集中的集权计划体制下无疑也为各地的“浮夸风、虚假风”等划开了一道深深的口子。第二,存在大量的“浮夸风、虚假风”。脱离实际的任务指标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各地为超额完成农具改革任务,不惜人为夸大所取得的成绩和群众的干劲,有的地方土法上马、蛮干快干,结果浪费了人力和物力,改造的农具几乎不适用;而有的地方“机关干部、工人、教职员、学生、理发工人、售货员和老汉、老太婆、少年儿童用水勺把扁担钩、椅子称等材料就造出了滚珠轴承。”<sup>[11]</sup>这些所谓的

“浮夸风和虚假风”的存在与当时“左”的思想和广大群众迫切想改变农业落后的面貌有关。第三,片面夸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是我党一贯坚持的原则,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靠搞群众运动、片面夸大群众的主观能动性虽然会激发群众热情,但不利于经济建设的平稳推进。在农具改革过程中,各级政府认为群众蕴藏着无穷的力量,要破除迷信,要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引下,喊出了“一天等于二十年”、“变废为宝”、“不迷信专家”等超越实际的口号,正如一首民歌所反映的当时群众的干劲是“技术革新群众化、个个都是土专家,红旗插遍普天下、党的领导顶呱呱”<sup>[12]</sup>(P180)。正是由于片面夸大了主观能动性,任凭群众热情高涨,这种超越客观实际和违反经济规律的农具改革运动最终在激荡的岁月中冷却。

#### 四、结语

“大跃进”时期的农具改革既是建国初期农具改良的一次延伸,也是在“左”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一场旨在改变我国传统落后的农业技术水平,以此提高农业劳动效率的运动,因历史条件的限制,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这场农具改革运动是在高度有效的权威集权体制领导下,在“左”的思想大潮引领下进行的,由于当时传统农具占支配地位以及工业化水平低等的时代条件限制,这场运动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的局面,反而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带来了沉痛的教训。当然,我们不能以当下的眼光去苛求于当时受历史环境限制的那些参与者,毕竟,在这场农具改革运动中,他们迸发出的激情和创造性,也由此取得的成绩应该是值得肯定的,这承载着

他们当时迫切想改变我国农业技术长期落后的面貌并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青春梦想。当激荡的革新梦想伴随着“大跃进”落下帷幕时,时间留给这场农具改革运动参与者和领导者的是苦涩的历史记忆。

#### [参考文献]

- [1]朱显灵,胡化凯.建国初期农具改良政策及实效分析[J].安徽史学,2007,(4).
- [2]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3]向技术革命进军[N].人民日报,1959-06-03.
- [4]中共湖北省委员会.技术大革命的萌芽—当阳县群众性的改革工具的经验[J].中国农报,1958,(9).
- [5]进一步开展农具改革运动[N].人民日报,1959-05-06.
- [6]技术革命的新时代[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 [7]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 1958-1965(农业卷)[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11.
- [8]李晓黄.把农具改革运动推向新高峰[N].人民日报,1960-04-06.
- [9]中共云南省委技术革新指导委员会编.农具改革经验汇集[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8.
- [10]赵紫阳.粮食生产速度可以加快[N].人民日报,1960-05-30.
- [11]咸阳县首举滚珠轴承化红旗[N].陕西日报,1958-08-10.
- [12]贵州大跃进民歌选[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59.
- [13]贵州省委关于农具改革运动情况的报告[M].贵阳市档案馆馆藏,第61-8-107卷,1958.

责任编辑:李丽娜